

# 中国古代文学

## 论李杜优劣之争

——兼对《李白与杜甫》的一点意见

张步云

在光辉灿烂的唐代诗坛上,闪烁着两颗永不陨落的巨星,这就是名冠当时、光照千古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如果说盛唐是唐诗的高峰的话,那末李杜的诗歌便是这座高峰的顶点。他们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①历代文人总是惯于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称为李杜。

是李杜并称,不分轩轻,还是杜优李劣?这个争论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进行着。争论的实质,是对浪漫主义作家如何评价的问题。从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的“时人谓之李杜”和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诗之豪者,世称李杜”的话来看,早在盛唐,李杜就已齐名并称。再从当时一些诗人对李杜的称赞来看,李杜在盛唐时就是并驾齐驱,驰名诗坛的伟大诗人。我们先看他们对李白的的评价。唐孟棻《本事诗·高逸》篇中说:“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里可以看出贺知章所再三称叹和欣赏的是李白的浪漫主义代表作《蜀道难》等篇。又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对李白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并指出了李白诗歌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色:“言多似天仙之词,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我们再看他们对杜甫的评价。韦迥在《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中说:“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②。郭受还在《寄杜员外》中说:“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属望劳”③。”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李杜的诗友任华,在他仅存的三首诗中,就有两首是称颂李杜的。盛唐诗人很多,而独独称颂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者,这说明他确认李杜是盛唐诗坛上这两类诗歌创作的杰出代表。他在《杂言寄李白》④中称道李白“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的傲岸性格及其“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画见孤峰出”的浪漫主义创作特色与“奔逸”风格。他又在《杂言寄杜拾遗》⑤中,赞扬杜甫直言好谏的性格及其“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的艺术力量和气势。因此可以说,文学史上首先并尊李杜者,也即是对唐诗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重者是盛唐诗人任华。

但在一篇中最早并称李杜者则是大历间的杨凭。《新唐书》卷一百六十《杨凭传》说他“大历中踵擢进士第”。他在《赠窦牟》中说:“直用天才众却嗔,应欺李杜久为尘。南荒不死中华

老，别玉翻同西国人<sup>⑥</sup>。”这是杨凭被贬在临贺（今广西贺县内）时所作。接着是窦牟，他在《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中说：“翠羽雕虫（指辞赋）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瑟无弹处，今作关西门下人。”<sup>⑦</sup>《旧唐书·杨凭传》云：“元和四年拜京兆尹。”此诗当作于元和四年，题称《奉酬杨侍郎》，可知杨凭为刑部侍郎京兆尹时作的。这也早于韩愈。古今所谓李杜并称始于韩愈者，乃是一大谬误。

然而在中唐却产生了“扬杜抑李”论。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姿，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很显然，这是针对盛唐“时人谓之李杜”而发的。在他看来，李杜不能并称，他从风格和形式上扬杜抑李，实际上也是对浪漫主义的贬抑。于是开了扬杜抑李的先河。接着是白居易，他虽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sup>⑧</sup>和《序洛诗序》<sup>⑨</sup>中并称李杜，但其基本态度是扬杜抑李的。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今古，颀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就是说诗要能感动人，教化人。“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毛诗序》）。比兴，则是要求诗有美刺讽托。白居易所谓“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者，就是指责李白无反映社会政治内容的作品，这实际上是针对盛唐“世称李杜”的提法而言的，认为从现实主义标准衡量，则杜优李劣，他们不能并称，这也是对浪漫主义的贬抑。元白的扬杜抑李论完全与任华的李杜并尊论针锋相对。

韩愈针对元白的杜优李劣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在他很有名的《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隐居诗话》谓“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韩愈以为不然”，便作此诗，“为微之发也”<sup>⑩</sup>。这话是有道理的。不过从“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两句来看，当时就盛行着一种扬杜抑李论，他批驳的对象比较广泛，不光专指元稹。否则韩愈是不会那样讲的。这种李杜并极推崇的提法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主义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人的同等并重。尤其可贵的是韩愈在诗文中并称李杜者竟达八处之多，表明了他捍卫李杜并称论的坚决态度，这对当代和后代的诗人影响很大。而且李杜并称之说，影响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在八世纪下半期至九世纪上半期的西域人维吾尔族年青诗人坎曼尔在《忆学字》中说：“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他把盛唐最有成就，最能代表盛唐诗歌概貌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结合起来，称为“李杜诗坛”。这个提法比韩愈又进了一步，实际上是对元白以现实主义为标准所得出的杜优李劣的否定。

晚唐诗人继承了盛唐和中唐韩愈等人的李杜并称论，而并极推崇李杜的。杜牧《访赵嘏》诗：“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言其大）动，翰苑鹤天（言其高）寒<sup>⑪</sup>。”他把盛唐诗中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杜甫和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李白，与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源头风骚，相提并论，同时也说明了李杜是继承《诗经》中的现实主义和《楚辞》中的浪漫主义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的。李商隐《漫成五章》（其六）中说：“李杜操持事略齐，三

才万象共端倪<sup>⑩</sup>。”他认为李杜无高低之分，他们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可等量齐观，在艺术上都尽工尽美。皮日休《鄂州孟亭记》云：“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sup>⑪</sup>”。更说明李杜是盛唐诗人中继承建安风骨的典范。此外陆龟蒙、司空图、裴说、杜荀鹤、韦庄、黄滔、祝元膺等诗人都是并尊李杜的。可知李杜并称风行于晚唐。

降及宋代，文坛上又掀起了一股扬杜抑李之风，其实这是中唐扬杜抑李论的旧曲重奏，但比中唐更有发展。这与当时理学兴盛有关。宋初欧阳修虽扬李抑杜，认杜甫之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彊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sup>⑫</sup>。但无有应者。相反扬杜抑李之风，甚嚣尘上。王安石虽曾说过李杜各有所长的话：“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sup>⑬</sup>但他的基本态度是杜优李劣。他把李白与杜甫的艺术风格作了比较，说：“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至于杜甫“盖其诗绪密而思深”，非“浅近者所能窥”，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sup>⑭</sup>。他在思想上更是贬低李白。他编集的李杜韩欧四家诗，其先后之序是以杜甫为首，李白为末。并认为李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sup>⑮</sup>。其实以“妇人与酒”之论，实为庸俗之见，根本不足以论李诗。李白诗的风格犹如诸子中之庄子。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篇》）。李白的诗境类于此。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的特色。然而宋代文人更多的是从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上来抑李扬杜的。苏辙说：“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sup>⑯</sup>。”赵次公在《杜工部草堂记略》中说：“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於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sup>⑰</sup>。”但在扬杜抑李中，调子唱得最高的要算罗大经。他对李白通过历史人物谢安来抒发自己“济苍生”、“安社稷”思想的《梁园吟》、《赠清章明府侄聿》、《赠韦秘书子春》、《书情赠蔡舍人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其三）等作品视而不见，他对李白通过浪漫主义方法反映安史之乱和表达他捐躯报国，杀敌平乱的《西上莲花山》（古风其十九）、《扶风豪士歌》、《奔亡道中》、《南奔书怀》、《永王东巡歌》、《赠张相镐》、《中丞宋公军次浔阳》等作品只字不提，竟不顾事实地说：“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而语哉<sup>⑱</sup>。”这只能说是妄立议论了。

但是与扬杜抑李相对的是当时的李杜并称论。王禹偁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邵雍说：“文章高摘汉唐艳，骚雅浓薰李杜香。”苏轼虽对李白参加永王璘幕府有所指责<sup>⑲</sup>。但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对李杜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到了南宋，李杜并称之说更为风行。南宋初年的张戒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他认为李杜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集大成者<sup>⑳</sup>。吕居仁说：“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sup>㉑</sup>。”葛立方认为“李太白杜子美皆掣鲸手也”<sup>㉒</sup>。陆游说：“濯锦沧浪客，青莲澹荡人。才名垂天地，身世老风尘。……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sup>㉓</sup>。”“数编在”、“物华新”，与韩愈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朱熹认为作诗必须以李杜为本。他说：“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土人治本经<sup>㉔</sup>。”戴复古在反对江西诗派时说：“举世吟哦惟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sup>㉕</sup>。”严羽更是并极推崇李杜。他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来说明李杜无优劣之分，各有千秋。他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认为“李杜二人，如金翅擎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sup>㉖</sup>。他还说：“诗之

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sup>②</sup>。”

元代文人不仅并称李杜，而且继南宋文人对唐宋以来的扬杜抑李论进行了批判。首先是元好问。他在《论诗》（三十首之三）中针对唐元稹的扬杜抑李论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珣珠。”他认为杜甫自有不可估价的艺术成就，不专在排比铺张（指杜甫长篇排律），排比铺陈只不过是杜诗中的一部分，并非上品，如把杜甫的诗歌成就只归于此，<sup>③</sup>太不识货，见识太小。接着对李白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所创造的巨大动人的艺术形象，<sup>④</sup>有很高的评价：“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万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著书生待鲁连。”<sup>⑤</sup>接，<sup>⑥</sup>体士赞说：“唐诗大家，数李杜为称首”<sup>⑦</sup>并在《同昌令送族弟襄归桂阳》一诗的注释中，<sup>⑧</sup>对罗大经之流的扬杜抑李论作了辩驳。他说：“邹味此诗，非一饭不忘君者乎！议者何厚诬太白不如杜哉<sup>⑨</sup>。”当然他只能以忠君的正统观念来为李白辩护，故不能正确地评价李白。正象王琦所批评的“以杜有一饭未尝忘君之誉，则索李集中思君恋主之句而极力表扬”<sup>⑩</sup>（《跋》）。虞集认为“唐人诸体之作，与代终始，而李杜为正宗。”

到了明清，由于经过南宋和元人坚持李杜并称论和对扬杜抑李论的相继批判，绝大多数文人都是李杜并称的。明代还出现了李杜合刊诗集。如许自昌辑的《合刊李杜分体全集》。刘世教的《合刊李杜分体全集》。这就从作品上把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并列在一起。并且他们在书序中预断其李杜诗歌将千秋并传。如王穉登在《合刊李杜诗集》序中说：“是刻既出，二先生之集将同运并行<sup>⑪</sup>。”许自昌在《刻李杜合集小引》中认为李杜的诗歌是“千年绝调”。并说：“若夫二先生之行事具在简策，品格具在月旦，读是集者当自喻之<sup>⑫</sup>。”朱茂时认为李杜是“兼备众调”、“熔铸古体”的集大成者（《李诗通》）。清魏裔介认为应用黄金铸李杜像。王琦还针对王安石的所谓白诗中多言“妇女与酒”，而目以为“人品污下”的观点作了批驳。他说这是“盖忘唐时风俗，而又未明其诗之义旨也。”杜诗中也有妇女与酒，不光李白。他认为此类诗“意有托寄”，“言多讽兴”。而论者“反以是相诋訾。”如果按照此逻辑抑李的话，那么《楚辞》中也有“望有娥，留二姚捐珣珠采芳以遗湘君下女之辞”，是否可得出“灵均之人品污下？”若“指其诗中篇篇有酒”，那么陶渊明应如何评价？是否因此就得出陶渊明“人品污下”<sup>⑬</sup>呢？这些批评很有说服力。梁诗正在《唐宋诗醇》中对李杜作了较系统的分析和评价，他对李杜并极推崇。他说：“李杜勃兴，其才力雄杰，陵轹古今，瑜亮并生，实亦未易轩轻”，说他们“齐驱中原，势钧力敌”；“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既论述了李杜创作上各自独有的特色，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色：“太白高逸，故其言纵姿不羁，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意；子美沉郁，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穷极笔势，尽乎事之曲折而止。”又简要地分析了他们创作上之所以产生殊异的原因，乃主要是由社会经历不同决定的。同时指出他们诗歌创作的作用与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托诗言志，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说：“若其蒿目时政，疚心朝廷，凡祸乱之萌，善败之实，靡不托之歌谣，反复慨叹以致其忠爱之志。其根于性情而笃于君上者，按而稽之，固无不同矣。”并认为李杜继承风骚优良传统并加以发展，扫尽齐梁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对后代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至于根本风骚，驰驱汉魏，撷之六笈之菁华，扫五代之靡曼，词华炳蔚，照耀百世，两人又何以异哉！”梁诗正还称赞了韩愈的李杜并称论，对唐宋的元稹、苏轼、王安石的扬杜抑李论又作了批评。

近人闻一多先生更是高度地评价了李白和杜甫，称他们是“诗中的两曜”。

从上述事实来看，唐宋以来的扬杜抑李论与李并称论反复地进行着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如何评价的问题。扬杜抑李者无视李白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解放，

反抗黑暗统治，憧憬光明的浪漫主义精神特征，无视浪漫主义不同于现实主义反映现实表现理想的艺术方法，也不理解李白诗中用花草树木的寓意，而用现实主义标准来比较李杜的优劣，从而得出杜优李劣的结论。

文学史上为什么出现扬杜抑李的现象呢？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本原因，是与论者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分不开的。白居易之所以扬杜抑李，是与他提倡新乐府运动有关系的。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富有社会政治内容，能直接为社会政治服务。尤其杜甫首创的新题乐府，对他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有很大影响。因此为了建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理论，要求诗歌创作反映国计民生大事，使诗歌创作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就必须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作为主要依据，那当然就扬杜了。王安石之所以扬杜，是因为他看到杜甫的诗歌与社会政治、现实人生结合得非常紧密，对他推行变法、改良政治有利。

郭沫若先生在一九六二年写的《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中也是并称李杜的，对李白与杜甫并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李白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可是他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李白与杜甫》，一反他过去的“李杜并列”论，褒李贬杜，极不公道。是否李杜并称就错，李优杜劣就对？我看值得好好研究和讨论。当然郭沫若先生若能以确凿可靠的材料得出李优杜劣的结论，那完全是可以的，但他扬李抑杜的论点有些是建立在孤证和主观推论上的。这里仅就他从杜甫对屈原的态度方面所得出的李优杜劣论，来说明这个问题。

郭沫若先生从杜甫对屈原的态度方面提出了以下批评：

一曰：“在杜甫入湘后的诗中，就只有一处提到屈原，而是带有谴责的意思的。

《上水遣怀》中有这样四句：

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郁没二悲魂，萧条犹在否？

这冷淡严格的态度有点惊人，照他看来，屈原和贾谊的遭到谗毁是活该，是咎由自取。”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一是杜甫入湘后的诗中是否只有一处提到屈原？二是是否诗中有谴责的意思？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杜甫入湘后的诗中不只一处提到屈原，请看下列诗篇：

1.《归梦》：“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

2.《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长笛邻家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上一首中的“楚辞招”，就是指屈原《楚辞》中的《招魂》，下一首诗中的《招魂》亦然。屈原《招魂》中说：“魂兮归来，反故居些。”而杜甫前首中的意思是自己“梦归未得，魂仍在楚，故不用招”（《杜臆》）。后一首前人提出不仅章法似屈原的《招魂》，而且认为杜甫之“思蜀州（高适）如向秀之思嵇康，今欲得敬诗以招蜀州如宋玉之招屈原也”（仇兆鳌注）。这都说明杜甫善于化用屈原的作品另创新意，或借屈原的遭遇来抒怀言志的。

3.《祠南夕望》：“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按：《楚辞》中有《山鬼》篇。湘娥即屈原作品中所说的湘妃。前人对这首诗评论较多。《杜诗镜铨》说：“结语极为含蓄，正见已与屈原同一情怀。”仇兆鳌注此诗说：“黄生云：‘此近体中吊屈原赋也。’结以自喻，日夕望祠，仿佛山鬼湘娥，如见灵均所赋者。因叹地虽清绝，而俯仰兴怀，万古共一长嗟。此借酒杯以浇块磊。山鬼湘娥，即屈原也，屈原即少陵也。”这些话都是很有见地的。提到了屈原的作品，心中当然有屈原，屈原和杜甫都是进步的政治诗

人，他们都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其遭遇颇为相似。故杜甫往往托《楚辞》寓己意的。所以仇兆鳌在杜甫《湘夫人祠》的注释中说：“公诗发源《楚辞》，波澜故自老成，此章意味深厚，可当近体中九歌。”这些都说明了楚辞对杜甫的影响。他既继承了《诗经》与《楚辞》的优良传统，又加以推广发展，即杜甫说的“风骚共推激”。难怪黄山谷说杜甫诗“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见《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其理恐在于此。杜甫对屈原的同情和艺术上的继承，完全渗透在艺术形象之中，这比只呼其人更为感人，更有实际意义。

4.《地隅》：“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

郭沫若先生对诗中的“楚大夫”考证为宋玉，不是指屈原，那是值得商榷的。

从宋玉《九辨》中的“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话来看，宋玉是有官职的，但究竟他任何官，史载不详。《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记载很简，未提到他任何种官职。《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事；刘向《新序·杂事》第一，记宋玉与楚威王问答事；《新序·杂事》第五记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事，与《韩诗外传》记载略同；《汉书·艺文志》载：“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三十三在“猿桂因地”下引《宋玉集》序云：“宋玉事楚怀王，友人言之宋玉，玉以为小臣”云云。以上均未提到宋玉为楚大夫事，只提到宋玉为“小臣”。最早的只有王逸《九辨》序说：“九辨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以作也！”以后《隋书·经籍志》说：“楚大夫宋玉集三卷。”郭沫若先生认为“宋玉在楚由‘小臣’而做到‘大夫’，故也可以称为‘楚大夫’”。但却未说到宋玉如何由“小臣”而做到“大夫”的根据。因此断定诗中的楚大夫为宋玉，也就无说服力。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为三闾大夫”。王逸《离骚》序说，屈原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因此旧注“楚大夫”为屈原是对的。因“三闾大夫”四字在五言诗中较难入诗，而“楚大夫”三字容易入诗。李白《悲歌行》：“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戴叔伦《同兖州张秀才过王参谋宅赋十韵柳字》：“岂学屈大夫，忧渐对渔叟。”曹邺《续幽愤》：“一逐楚大夫，何人为君雪。”罗隐《杜陵秋思》：“只闻斥责张公子，不觉悲同楚大夫。”其中的“屈大夫”、“楚大夫”均指屈原，这也可作为旁证。另外杜诗中往往是把屈原与王粲，或把贾谊与王粲联系起来歌咏的，很少看到把宋玉与王粲结合起来的。因屈原与王粲，贾谊与王粲的身世有相似处，在忧时伤乱方面也有相似之处。而宋玉在这方面与王粲并无相同之处。

再谈第二个问题：“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此诗中是否有谴责的意思？我细读上下文，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谴责的意思”，相反却看到杜甫对屈原和贾谊的崇敬和怜惜。屈原之所以受到保守派的谗毁，是由于他为了君国而“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即所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缘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这说明他是“忠直取忌”（仇兆鳌语），而不是象郭沫若先生所理解的“是活该”。“咎由自取”之意是有的，但这并非指责，而是少陵托古伤今，意在“自责”；而且这“自责”也非真意，其意乃少陵遭谗而自伤也。故下两句说：“郁没二悲魂，萧条犹在否？”认为他与贾谊，俱流长沙，其忠魂可悲。真是伤己吊古，同情哀怜之情倾注于辞。

二曰：“含有敬意的辞句是以‘屈宋’并称，含有谴责或抗衡的辞句则以‘屈贾’并称”。是否如此？这就要看杜甫对屈原和贾谊的一贯态度了。

我们先看杜甫对屈原的态度，除上面所举的杜甫入湘后的作品外，再看下列例证：

1. 向来吟《桔颂》，谁与讨蓴羹。（《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2. 先生有道出羲皇，

先生有才过屈宋。（《醉时歌》） 3. 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 4.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 5.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 6. 羈离交屈宋，牢落值颜闵。（《赠郑十八贲》） 7. 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 8. 不可久为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返照》） 9.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 10. 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偶题》） 11. 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怀三十韵》） 12. 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送覃二判官》） 13. 易下杨朱泪，难招楚客魂。（《冬深》）

合前例提到屈原者就有十八处之多，其中内容丰富，学习屈原的作品，称颂屈原的才能，并托诗投赠。总之，怜惜仰慕之情溢于言辞，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继承，前人说杜甫所得“在骚”（《韵语阳秋》）这是有道理的。

再看杜甫对贾谊的态度：

1. 贾生对鹏伤王傅，苏武看羊陷贼庭。（《题郑十八故居》） 2. 贾生恸哭后，寥落无其人。（《别蔡十四著作》） 3. 去国烹王粲，伤时哭贾生。（《久客》） 4. 贾谊昔流桷，匡衡尝引经。（《同元使君春陵行》） 5. 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春日江村五首》） 6. 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发潭州》） 7. 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入乔口》） 8. 鹏鸟长沙讳，犀牛蜀郡怜。（《哭韦大夫之晋》） 9. 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清明二首》） 10. 裁感贾生恸，复闻乐毅书。（《别张十三建封》） 11. 贾谊恸哭，虽多颠沛。（《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

合上举屈原例中的《壮游》与《水上遣怀》，说到贾谊有十三处之多，对贾谊作了很高的评价，对他为国事而恸哭，极为崇敬。这是抑贾谊，还是扬贾谊，不是很清楚了吗？既然在杜诗中屈原和贾谊分开来都称道，而屈贾合起来为何就谴责和抗衡呢？

郭沫若先生还举了杜甫《壮游》诗中的“气劘屈贾垒”来说明杜甫对屈贾的谴责。他说：“自己的气势能使屈原和贾谊的壁垒披靡。”这也是难以服人的。这句诗的下面还有“目短曹刘墙”一句。曹，指曹植；刘，指刘桢，他们都是建安诗人，很能代表建安风骨。那么是否也因此得出杜甫轻视建安诗人，也贬抑曹刘呢？绝不能，在杜诗中称道曹刘的就有七处之多。因此《壮游》中所说的“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反映了杜甫既能批判地学习前辈如屈原、贾谊、曹植、刘桢等诗人的优秀成果，但又不迷信前人，拜倒在前人脚下，要求自己的创作要有创造性，并超过前人。这正是他可贵的地方，那还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呢？李白诗中不是也有“荆门倒屈宋，梁园倾邹枚”（《赠王判官》）的豪言壮语？对此郭沫若先生视为表扬屈原呢，还是谴责屈原呢？

三曰：“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的。‘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的就是宋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雅儒亦吾师。’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处。”

李白佩服不佩服宋玉，有他自己的诗可证：

1. 宋玉事楚王，能为高唐赋。（《赠溧阳宋少府陟》） 2. 地远虞翻老，深秋宋玉悲。（《赠易秀才》） 3. 襄王怜宋玉，愿入兰台宫。（《寄上吴王三首》） 4. 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宿巫山下》） 5. 散下楚王国，分浇宋玉田。（《安州应城玉女汤作》） 6. 茫昧竟难测，虚传宋玉文。（《感兴》） 7.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感遇》四首）

诗文中单独提到宋玉就有八处之多。如和屈宋并称的计算，就有十一处。诗中说他立身高

洁，能诗能赋，曲高和寡，并为他因受谗与楚王恩情中绝而非常惋惜。为怀念他而“沾裳”。怎么说李白不佩服宋玉呢？当然在封建社会，文人雅士惯于悲秋。李白在当时能唱出“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的健康调子，这与宋玉的悲秋的悲凉感情是不同的，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否真的批宋玉，反宋玉，就很难说。因从上例看，他讲到“深秋宋玉悲”时，辞中似乎体会不出批宋玉的意思。

四曰：杜甫“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屈原毕竟高于宋玉，屈宋并举，也就是抑屈扬宋。”屈宋并称，古已有之。《文心雕龙·辨骚》中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可见并非杜甫创造。文学史上，惯于把同派别，同时代，同身世，同有成就的文人的名字放在一处并称。如枚马，扬马，班马，曹刘，陶谢，王杨卢骆等等。这本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按郭沫若先生的这个逻辑推论，谁要是把“屈宋并举”了，“就是抑屈扬宋”，李白也是屈宋并举的，那当然他“就是抑屈扬宋”了，请看李白诗文：

1. 荆门倒屈宋，梁园倾邹枚。（《赠王判官》）
2. 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于言。（《夏巨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
3. 宋玉似于屈原。《上安州李长史书》

据此，李杜二人对宋玉的态度似乎看不出有什么本质不同，因此郭沫若先生在从其对待屈宋的态度上所得出的李优杜劣论也是难以成立的。

回顾文学史，从任华开创的李杜并尊，经过扬杜抑李和扬李抑杜的争论，时达千余年，但其基本倾向仍是李杜并称。因为这个提法反映了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并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当然从嘲讽君主，粪土王侯，鞭挞权贵，抨击豪门，反抗封建秩序和传统观念，以及追求个性解放来说，杜甫不及李白。但从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来说，从完备诗歌形式的多样化规范化来说，李白也是稍逊于杜甫的。但他们都是文学史上诗人的优秀代表。是异翻而同飞，双声而合响的第一流诗人。他们以各自独有的艺术成就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宝库，完成了唐诗的革新，把唐诗的发展推到一个高峰，在文学史上有继往开来的作用。我们对他们应批判地学习，不要搞什么杜优李劣论，或李优杜劣论。我非常同意郭沫若先生一九六二年写的《诗歌史中的双子座》中的观点：“最好把李白和杜甫的结合起来，李白和杜甫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样对批判继承中国丰富多采的文学遗产有好处。

一九七八年春脱稿

一九七九年夏为我院学术讨论打印时修改定稿

注：

- ① 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十。②③ 见《全唐诗》卷二六一。④⑤ 见宋计有功《全唐诗纪事》卷第二十二。⑥⑦⑧ 见《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九、卷二百七十一、卷四百七十八。⑨ 见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第三十八。⑩⑪《全唐诗》卷五一〇。⑫⑬⑭⑮⑯ 见宋胡仔纂《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卷五、卷六、卷五。⑰ 见《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三。⑱ 见《皮子文藪》卷第七。⑲ 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二十九。⑳㉑㉒㉓ 见《李太白文集》卷三十四、卷三十三。㉔ 见《鹤林玉露》卷六。㉕ 《岁寒堂诗话》。㉖ 《韵语阳秋》。㉗ 《读李杜诗》。㉘ 见《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诗）。㉙ 《论诗七绝》。㉚㉛ 见《沧浪诗话》。㉜ 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部丛刊）》卷十七。㉝㉞ 见《李太白文集·跋》。㉟㊱ 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